

明清广东刻书质量考述

罗 志 欢

广东地区雕版技术,在南宋时已称极精,刻印过《九家集注杜诗》和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等“惊人秘笈”^①。就刻印质量而言,足以抗衡吴、越、闽三方之盛。降及明清两代,广东地区刻印书籍进入了鼎盛时期。雕刻印刷业十分普及,有些地区男女老少皆谙悉雕木刻字技术,因而受到外地的重视。

明清广东地区雕版印刷,总体数量上不及发达地区,而刻印书籍的质量,特别是官刻和家刻的质量在全国是有影响的。

明代广东的刻版上承宋元,有些明代早、中期刻本或覆刻宋元本,仍存宋元馀风,尤其某些地方特色较强的刻本,更为后人所称誉。近代广东著名藏书家徐信符认为,明朝“隆庆、万历而后,乡先哲遗著,其属于家刻者,多属写刻,字体端正,不至令人望而生厌。”从来镌工之美恶,视乎书法之优劣。他举例说,明末清初,邝露的《峤雅》,原刻本颇为精美,此书为邝氏自书,并督人雕刻,虽原本有杂用奇字,辗转假借,体多晚俗,不尽可为典要之病,然其“字有体势,锋棱活动,非良工不易为。”梁朝钟《喻园集》,书用颜柳体,端严有度,楷法亦甚精工。又如王隼所刻《文苑综雅》、释大汕所刻《离六堂集》,“其雕刻亦非鄙俗”^②。

徐信符认为,官刻本也有不少佳作。明正统五年(1440),广东布政司刻杨士奇《少师东里杨公文集》25卷。此为杨氏手自选择之本,板式古雅,字画刀刻,“尚有宋元之遗”^③,堪称精刻。明成化九年(1473),韶州府校刻余靖《武溪集》20卷。此为黑口宋人集,“世以为珍”^④。明成化十八年,吴县张习为广东按察司僉事。其“嗜刻书,号称精雅,为世所重”。在广东任内,刊刻了《姑苏杂咏》、《槎轩集》、《眉庵集》、《北郭集》、《静居集》、《夷白斋集》、《侨吴集》等书。黄丕烈《跋》称所刻《侨吴集》:“刊本字迹古雅,与新藏张来仪、徐北郭

①李致忠:《宋版书叙录》第311页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4年。

②徐信符:《广东版片记略》,载《广东文物》卷九,第8页,上海书店,1990年。

③(清)莫伯骥:《五十万卷楼书目》卷十九,第1126页,民国25年(1936)江阴缪氏刊本。

④(清)黄丕烈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卷八,第7页,民国8年(1919)江阴缪氏刊本。

诸集悉同。”《跋》称所刻《眉庵集》：“向书估从太仓收来者，非企翱（张习）所梓，故不之取。”莫友芝《跋》称：“明成化弘治间，张习曾刻明初四大家杨基《眉庵集》、张羽《静居集》、徐贲《北郭集》、高启《槎轩集》于广东，至为精善。”^①明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，广东崇正书院刻《汉书》120卷、《后汉书》120卷。每半叶10行，每行22字。张文虎《舒艺室随笔》认为是刻胜于毛本《汉书》^②。莫伯骥《五十万卷楼书目》则认为“善处甚多”，“与宋本合，不与俗本同。”“当是翻刻余襄公靖校定之本，故能如此精善。”^③

清代广东刻版被后人称誉的亦不少。阮元和张之洞先后担任两广总督，在粤提倡朴学，劝人刻书，广东地区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，人们对书籍流通的需求急剧增加。所以，清道光以后，广东地区的藏书、刻书业兴旺发达。官私刻书风起云涌，可谓一时风气大开，名篇巨著，居各省之冠。由于学者直接参与访求古籍，校勘刻印，广东地区的官刻和家刻仍保持讲究质量的优良传统，坊肆所刻也没有因书籍流通的增加而下降，反而有了显著提高。在清代中后期，广东地区刻印数量超越了发达地区，走在全国的前列，成为新的刻书中心，刻印质量也受到普遍的好评。所刻之书校勘精审，版本完善，很受社会人士的重视和称赞。

官刻方面以学海堂、广雅书局为代表，刻书数量居全国众书局之首。当时著名学者陈澧为学海堂学长，主持刻书事宜。所刻《学海堂丛刻》、《剑光楼集》、《南海百咏》、《国朝岭南文钞》、《岭南集》等要籍，皆校勘精审，版式古雅，最为流行。

广雅书局是专司刻印古籍的机构，规模弘大，章制严密。有“提调”专司雕刻印刷诸事；“总校”提挈文字校勘事宜。下设分校多人，每雕刻一书，卷末必署名，某人初校，某人覆校，某人总校，以专责成。故广雅版本，必经三校，“迥异俗本”。清乌程严可均费二十七年心力，独自编纂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起上古迄隋，分代编次为十五集，七百四十六卷，收录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，“唐以前著作者，庶几大备。而历代之化成，亦灿然可观矣。”^④洵为《全唐文》之前接部分。此书甫成，扬州鲍氏拟刻不果，黔县俞氏为祁文端校写文目，亦未刊。直到清光绪年间，黄岗王毓藻为两粤运使，集合二十余人，经八年功夫，八次校讎，始交广雅书局，并由羊城西湖街富文斋承刊而成。参加勘定者为广雅书局廖泽群、陶春海、黎震伯等。广雅书局刻书在全国影响最大。

私刻方面以番禺潘仕成、南海伍崇曜、新会陈焯之等为代表。

①黄荫普：《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》第273页，香港黄氏忆江南馆，1978年。

②（清）张文虎：《舒艺室随笔》卷五，第1页，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金陵冶城宾馆刊本。

③（清）莫伯骥：《五十万卷楼书目》卷四，第221页。

④（清）王毓藻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序》，载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卷首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58年。

潘仕成辑刻《海山仙馆丛书》，开粤人所刻丛书收录西人著作风气之先。各书附以大量插图，颇具特色。丛书之外，所刻《佩文韵府》、《水雷图说》，及其族人所刻《听帆楼书画记》、《朱批唐宋诗醇》、《五色批古文渊鉴》等，雕刻颇为精工。

伍崇曜以延聘著名文献学家谭莹辑刻《粤雅堂丛书》、《岭南遗书》等而闻名于世，“以视琴川毛子晋，邬镇鲍廷博，殆如骖之靳。”^①至校刻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，诚为异书，张金吾《金文最》亦属名著。

清道光、咸丰以来，文化事业繁荣发达，出版蓬蓬勃勃，而潘、伍二家的刻书为出版界起到了示范的作用。于是书肆主人，亲炙观摩，切磋琢磨，争相摹仿，以求传世。所以这一时期坊肆所刻亦不俗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坊刻本质量的想法。如藏修堂主人刘晚荣辑刻《藏修堂丛书》、番禺冯兆年辑刻《翠琅玕馆丛书》，其版式均仿照《粤雅堂丛书》和《海山仙馆丛书》，亦一清供良品。

继潘、伍之后，孔广陶所刻《袖珍本古香斋十种》，诸名家校本《北堂书钞》，亦足称述。《岳雪楼书画录》为写刻本，更为精绝。

陈焯之聘请李文田、史澄等校勘，刻成二十四史，刻工精美，形式大观，纸质优良，诚属难得。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谓此书无校对，“闻其《史》、《汉》等二三部经校者意改字甚多，故迟迟未印行。今颇行矣，人亦不重之。”^②首先莫氏是风闻其事，并未亲见其书；其次“盖由嫉忌使然”^③。因为莫氏曾入曾国藩幕，参与江南官书局校勘之事，当时江宁、江苏、淮南、浙江、湖北五局合刻本，版非一律。而陈氏所刻版归一式，整齐划一，远胜五局合刻本，洵为私家刻书之典范。

越华书院院长叶衍兰，自写刻《李长吉诗集》，简端兼录黎简等评语，印以朱色，尤为精绝，人皆宝之。又写刻《金刚经》、《叶小鸾》、《返生香》等，书法之工，“世人每以宋泉币之瘦金书相拟焉”^④。又如胡伯蓊手书《陶渊明集》，逼真东坡笔意，此即后人所说的“苏书陶诗”。

陶福祥为学海堂学长，镕经铸史斋管理学海堂版片，于印刷术素有研究。其“爱庐”所刻，如覆宋本《蔡中郎集》、《陈后山集》、《朱韦斋集》、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，皆巧匠良工，故与俗本不同。番禺陈昌治一字一行本《许氏说文附通检》，皆艺术精良。

博学之士，著述等身。他们的著作不但内容充实，富于创见，而且十分注意刻版的质量，以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如陈澧《东塾丛书》、《东塾遗书》、

①徐信符：《广东版片记略》，载《广东文物》卷九，第9页。

②（清）莫友芝撰，傅增湘订补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四，第2页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。

③④徐信符：《广东版片记略》，载《广东文物》卷九，第9页。

《东塾读书记》、《东塾集》等；林伯桐《修本堂丛书》；李光廷《榕园丛书》（又名《守约篇》）、《汉西域图考》、《广元遗山年谱》、《倪云林年谱》、《宛谔书屋文钞》等；梁廷楠《藤花亭十种》、《南汉丛书》、《夷氛记闻》、《粤秀书院志》、《越华记略》、《东坡事类》等；吴兰修《南汉纪》、《南汉地理志》、《南汉金石志》、《端溪砚史》、《桐华阁词》等；张维屏《松心十集》、《听松庐诗文集》、《国朝诗人徵略》、《艺谈录》等；黄培芳《岭海楼集》、《唐贤三昧集评》、《粤岳子》、《虎坊杂识》、《浮山小志》、《香石诗话》等；朱次琦《九江集》、《朱氏传芳传》、《朱氏家谱》等；简朝亮《尚书疏证》、《礼记孝经疏证》等，版亦良善。还有一些传本甚少的笔记，不但在内容上足供采摭，而且在刻印方面也很考究。例如，释大汕的《海外纪事》，有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，其书雕印工雅，富有特色。

清代广东地区刻书成风，且讲究质量，外地学者在广东的刻书亦受到感染。巴陵方功惠在广东以富藏书著称。清光绪年间，就所藏秘本，选择刊刻为《碧琳琅馆丛书》，所收皆难得的孤本，刻版亦雅善。方氏所刻陈鸿墀《全唐文纪事》，黄冈王氏所刻方氏藏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^①，皆为孤本。别有《朱墨本李义山诗集》、《三宋人集》，所刻亦精善。汉阳叶志诜在广州有“平安馆”，收藏图书彝器甚多，吴荣光《筠清馆金石录》多加以采录。所刻书，书写精良，雕镂灵活，最为美善。如《状元图考》、《梅花喜神谱》、《瘞鹤铭考》、《焦山鼎铭释》、《刘跂泰山秦篆谱》、《遂启祺鼎铭》等，书法韵秀，镌工巧妙，技术精湛，“其艺术足令人钦佩”^②。此外，浔阳万氏在广东覆影胡刻《文选》，亦属艺术良品。

清朝末年，学校兴而书院废，铅印兴而雕刻式微，于是版刻渐渐衰替。但是，广东地区仍有锲而不舍的刻书家。民国而后，如东莞陈伯陶所刻《聚德堂丛书》、张其淦所刻《东莞诗录》、《元代明代遗民诗咏》等、番禺汪兆镛所刻《画人传》、《澳门杂诗》、《陈东塾遗诗》、《公孙龙子注》等，虽属凤毛麟角，然其版刻在全国都有影响。

在各种刻本中，坊刻本的质量向被认为最下，然亦有称道之佳作。明代广东的刻书坊鲜见文字记录，清代较著名的则有富文斋、翰墨园、五桂堂等。

富文斋，在广州西湖街内。主人姓余，清嘉庆至民国间，承揽公私刻书，世代相继经营，是广州著名的刻书铺之一。学海堂、菊坡精舍、广东书局所刻各书，多为富文斋承印；伍崇曜、陈澧等私家刻的部分书籍也由富文斋印刷。所刻书籍经、史、子、集俱全，大抵因雕刻疏隳，行款韵秀，而行销全国。从广东一些图书馆所藏古籍中，可以找到很多富文斋刻印的书籍。例如：黄培芳辑《浮山小

①清光绪年间，粤运使王毓藻借广雅书局之力，集合了28个文人，经过八年工夫，八次校讎，才将此书刻印出来。1965年中华书局重印，增附篇名及作者索引，颇便阅读，堪称最佳印本。

②徐信符：《广东版片记略》，载《广东文物》卷九，第9页。

志》、宋湘《史传事略》、洪颐煊《读书丛录》、杨学颜等纂修《恩平县志》、祝淮纂修《香山县志》、张维屏《桂游日记》、张维屏《花甲闲谈》、邓翔《知不足斋诗草》、陈澧《番禺陈氏东塾丛书》等清人著作。

翰墨园,主人为骆浩泉。在清道光至光绪间刻了很多书籍,行销全国,是广州著名的书坊之一。该书坊刻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朱墨套印本、五色套印本居多,色彩比较显目。内容以医书和诗文集为主。所知见套印本有:《五色批五家评点杜集》(六色套印本)、《昌黎先生诗集注》、《七修类稿》、《史记菁华录》、《史通削繁》、《史通通释》、《朱批苏文忠公诗》、《徐孝穆全集》、《南北史摭华》、《唐贤三昧集笺注》、《海录轩朱批文选》、《纪氏朱批苏诗》、《朱批韩文》、《朱批陶诗》、《朱批庄子》等。

五桂堂,在广州西关第七甫(今光复中路)。主人为广东花县徐学源、徐学成兄弟。书坊创办于清光绪中叶,民国初年还在香港设立分店(1972年关闭)。以专印发售木鱼书、南音、龙舟、曲本、小说而扬名省港澳。该书坊起初的木鱼、南音、龙舟等书,不少交由顺德县马冈村刻版后运回广州印刷。所刻大批木鱼书、南音、龙舟、粤讴、班本、俗曲以及课本、通书、日历、四书五经、旧小说等,行销省港澳,远至海外。

清乾隆年间,广东民间雕版印刷业发展迅速,成为书籍的主要产地之一。最著名的是广东顺德县的马冈村,后来逐渐发展到广州和佛山。广东的刻工多有妇孺参加,价格也较其他地区便宜,因而吸引了不少外地出版者。志书记载,当时苏杭一带的部分书商往往到广东刻版,将书版运回当地印刷。各地的一些官员也将自己的著述送到广东刻印。

清[咸丰]《顺德县志》卷三“舆地略·物产”:

今马冈镂刻书板,几遍艺林,妇孺皆能为之。男子但依墨迹刻画界线,余并女工。故值廉而行远。近日苏州书贾往往携书入粤,售于坊肆,得值则就马冈刻所欲刻之板。刻成,未下墨刷印,即携旋江南,以江纸印装,分售海内,见者以为苏板矣。^①

这条资料,除了说明顺德马冈妇孺皆能镂刻书版和工价低廉外,最值得注意的是,外地书商携书入粤所刻书版,“见者以为苏板”。说明马冈妇孺所刻书版逼似苏版,其质量之高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《学海堂初集》卷十四录有南海李应中、梁鉴,高要何惠祖等人所写的“梓人诗”,中亦叙及马冈刻书:

李应中诗略云:“红闺新样纷迭出(今顺德马冈村人多刻字为业,而女工尤盛),唐版宋刻无光辉。”“流传未若付梓便,手翻万古藏书帷。”“还闻异物不胫走,良迁远地无残坠(今江浙板多粤刻)。”“三吴闽越虽亦好,价廉岂若多工倕。”^①

^①(清)郭汝诚修,冯奉初等纂:《顺德县志》卷三,第50页,清咸丰三年(1853)刊本。

何惠祖诗略云：“郑刀鲁削因地产，虽有利器巧拙殊。”“北人为车南人梓，吾粤剞劂天下无。”“江浙书坊甲五都，坊板半出南方沽。”“归装满载梨与枣，不数翡翠夸珊瑚。”“马冈攻木亦绝技，何必尺寸师公输。”^②

李、何二氏之诗，文辞虽有些许夸张，但亦印证了马冈刻版质量可靠，及其在全国的影响。汪宗衍先生认为广东刻工“稍逊于江浙”，《皇清经解》、《广雅丛书》、《粤雅堂丛书》、《士礼居丛书》等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大型丛书，即出自马冈女子之手^③。

或刻书水平参差，或财力不足，或片面追求工速和利润等，刻印质量不能保证。因而一地之刻书，自是有高低优劣之分，明清广东刻书质量同样存在这种情况，清代学者曾就此表示过不满和批评。但就整体而言，“广东槧本书籍，自宋至近代皆有名。”^④考察广东雕版印刷书籍的历史及其所刻印书籍的数量和质量，这一结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暨南大学图书馆

①（清）阮元等辑：《学海堂初集》卷一四，第22页，清道光四年（1824）至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羊城简书斋、富文斋刻本。

②（清）阮元等辑：《学海堂初集》卷一四，第23页。

③汪宗衍：《清代女子刻书》，转引自黄国声：《广东马冈女子刻书考索》，载《文献》1998年第2期，第268页。

④黄慈博：《广东宋元明经籍槧本纪略》，载《广东文物》卷九，第11页，上海书店，1990年。